

努力繁荣现代戏创作

河南省戏曲工作室

河

目 录

大力提倡和扶植戏曲现代戏·····	吴 雪
——在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	
艺术与生活·····	郭汉城
总结经验 塑造新人·····	贺敬之
——在《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召开的“塑造社会主义 新人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浅议·····	杨志杰
为提高现代戏曲创作水平而努力·····	凤 子
——戏曲、歌剧现代题材剧本讨论会札记	
戏曲现代戏三题·····	张 庚
戏曲作家谈提高现代戏的质量	
努力熟悉本剧种的艺术特点·····	黄俊耀
从生活出发·····	徐 进
要象要美·····	顾锡东
曲折的情节和高尚的情趣·····	魏 峨
创造现代戏的新程式·····	胡小孩
写自己熟悉的感动的·····	刘奇英
现代戏创作随录·····	杨兰春
生活·典型·戏剧·····	胡小孩
建设戏曲现代剧目问题·····	张 庚
农村题材大有作为·····	周巍峙
一出讴歌新人的好戏·····	丛 聿
——评《红柳绿柳》的艺术特色	
《喜盈门》的启示·····	石方禹

提倡和扶植戏曲现代戏

——在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

吴 雪

全国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现在正式开幕了。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我代表文化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欢迎。粉碎“四人帮”以后，把戏曲现代戏这样集中地在首都文艺舞台上演出，这还是第一次。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检阅一下近几年来戏曲现代戏创作演出的成果，也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以促进戏曲现代戏创作的更大繁荣。

我国的戏曲，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剧目更是丰富。全国的戏曲剧团在三千个以上，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深远而密切的联系。因此，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建设时期，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它的战斗作用。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平剧院成立时，毛主席就提出了“推陈出新”的方针，为戏曲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推陈出新”的方针，不仅要求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整理改编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同时还要求我们以戏曲艺术的形式反映当代人民的生活，创作和演出戏曲现代戏。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必须着力塑造新人形象，以反映今天的时代风貌。这就要求我们从事这一创作活动时，既不脱离原来的剧种所独具的艺术特色，又要很好地对传统的戏曲艺术形式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比较

完美的统一。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广大戏曲工作者搞了几十年，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中间也经历过许多的曲折。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便开始了创作和演出戏曲现代戏的艺术实践。京剧《赵家镇》、《钱守常》、《夜袭飞机场》以及后来具有广泛影响的秦腔《血泪仇》和眉户戏《十二把镰刀》等，当时都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一九四四年延安平剧院演出的经过整理改编的历史剧《逼上梁山》，毛主席看后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赞“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并希望戏曲工作者“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这一时期出现的另外几个戏，如《三打祝家庄》、《宋江》以及《嵩山星火》等，也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久这一工作出现了曲折，康生故意夸大戏曲现代戏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某些缺点，硬不让延安平剧院再演戏曲现代戏。就这样，戏曲现代戏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建国初期，我们在戏曲艺术推陈出新的工作上，主要是提出了要剔除传统剧目中的糟粕，澄清舞台艺术形象，但同时也注意到了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周总理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五签发发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我国广大戏曲工作者热情地投入了新的生活，并很快地创作演出了评剧《小女婿》、《刘巧儿》和沪剧《罗汉钱》等一批优秀的戏曲现代戏的剧目。到了一九五八年，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全国许多戏曲剧团和很多著名的戏曲艺术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了戏曲

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京剧《白毛女》、豫剧《朝阳沟》等就是当时出现的优秀的剧目。记得李少春、杜近芳等同志演出京剧《白毛女》时，在戏曲界和群众中引起了重视。周恩来总理出访回国的当天，便亲临观看。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当然，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戏曲表现现代生活问题，毕竟还是在探索阶段，艺术上不免还很幼稚；同时，由于受当时的政治思潮影响，在工作上也有着单独的追求形式和数量，一哄而上、粗制滥造的现象。但很快就得到了纠正。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专门邀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些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着重讲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比较系统地纠正了大跃进中文化艺术工作上的一些偏差，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总结了经验教训。后来周总理明确提出了戏曲工作要坚持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者并举”的方针，使戏曲艺术的发展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康生又公开提倡上演坏戏，上海的张春桥等就闹起了“翻箱底”，坏戏越来越多，造成了各种坏戏在全国的泛滥。这种现象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视。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和六三年的几次讲话中对此都进行了批评，并明确提倡“要演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代的革命戏”。一九六三年在周总理的倡议下召开了首都戏曲工作“推陈出新”座谈会，文化部发出了准备举办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通知。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目，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黛诺》、《六号门》、《节振

国》、《红嫂》等等。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呈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就在这时，江青却插了进来。在十年内乱时期，她更进一步对广大戏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进行了公开的掠夺和篡改，钦定为所谓“样板戏”，作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资本；并利用这几出“样板戏”，把一切优秀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她不承认的现代戏如《打铜锣》、《游乡》等都统统赶下了舞台，制造了“八亿人只能看八个戏”这样一种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戏剧舞台在“双百”方针指引下，重新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戏曲现代戏的创作也出现了京剧《南天柱》、《一包蜜》，秦腔《西安事变》和越剧《报童之歌》、《三月春潮》、花鼓戏《野鸭洲》等一些比较好的剧目。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戏曲艺术推陈出新的道路是多么的曲折不平，但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显著的，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促进我国戏曲艺术的繁荣，就必须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三者并举”的方针，还必须大力提倡和扶植戏曲现代戏。

戏曲表现现代生活，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也是戏曲艺术本身发展的需要。戏曲现代戏反映的是当代人民的生活，塑造的是当代人的形象，因此它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和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它往往能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起到比较直接的教育鼓舞作用。我们的国家已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举国上下都在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中间，既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也显示着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创造精神、崇高理想和英雄气概。戏曲艺术必须充分表现这些内容，才能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今天的观众成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人占很大比重。这些青年热情奔放，求知欲强，又最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他们除了要从戏曲中得到艺术享受之外，也要从中来认识我们的时代。戏曲艺术必需适应这种需要，反映现实生活，塑造新人形象，以便争取观众，特别是争取广大青年观众。否则，必将脱离群众，脱离时代，这样就必将日趋衰落，以至消亡。曾经雄踞元代和明初剧坛的杂剧，就是因脱离时代和群众而消亡的先例。新的时代、新的任务和新的观众，向戏曲艺术提出了新的课题，她必须有力地反映现实生活。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戏曲要反映现实生活，面临的困难是很多的。十年内乱时期，“四人帮”对“样板戏”的掠夺和篡改，严重地败坏了现代戏的声誉，伤了广大戏曲工作者的心，也倒了广大观众的“胃口”，给今天创作演出戏曲现代戏留下很多后遗症。同时，由于“四人帮”搞乱了正常的艺术生产程序，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影响到了剧团内部，再加上剧团管理体制和某些经济制度、人事制度存在的问题，都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

戏曲现代戏历史较短，她在表现现代生活与自身固有的艺术形式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可以说，搞戏曲现代戏，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比搞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要多得多。这些都给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增加了很多困难。

此外，我们的戏曲创作人员，特别是戏曲现代戏的创作

人员，社会地位不高，有些戏曲团体甚至还没有创作人员的编制。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都很差；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对戏曲现代戏又是抓而不紧，往往满足于一般号召，措施不够具体和有力。有的仅仅是为了应付汇演，没有长期坚持搞现代戏的打算。总之，搞现代戏确是困难重重。正因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困难多，所以就特别需要大力提倡和加意扶植。

尽管困难那么多，还是有不少戏曲剧团一直千方百计地坚持创作和排演现代戏。例如中国评剧院、上海沪剧团、河南豫剧三团、山东吕剧团、浙江越剧二团、湖南花鼓戏剧院、山西临漪县眉户剧团和陕西戏曲研究院眉碗剧团，以及去年召开八个省、市戏曲现代戏座谈会的所在地江苏省一省就有十二个县级戏曲剧团一直坚持创作演出现代戏，等等，都是应该予以表彰的。

为了提倡和扶植戏曲现代戏，去年春天文化部发出了决定在今年举办全国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的通知以后，得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广大戏曲工作者的支持和响应。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都搞出了戏曲现代戏。有的还举行了地区的汇演。有的省、市，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剧团，领导同志还亲自深入现场指导创作和排演。这次汇报演出的七台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选拔出来的。没有选出来的，有的还在加工，也许有些较好剧目，还没有被这次选上来，都是可能的。去年在南京召开了戏曲现代戏座谈会，成立了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他们这一年一次的年会，也将与我们的汇报演出同时召开，以便进一步研究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和发展问题。

现在从这些剧目的整体来看，题材还是比较广泛，它们

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也是健康、正确的。其中有些剧目，颇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七台戏中，除省市剧团之外，多属地区或县一级的剧团，他们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尤其难能可贵。我们要特别为之祝贺，要向他们学习。

这次汇报演出，主要目的是在总结和交流戏曲推陈出新的经验，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把戏曲现代戏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再提高一步。希望这次演出的一些剧目，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修改，争取搞得更好，成为戏曲现代戏的保留剧目。在演出期间，各省都有一些来京观摩的同志。他们将与参加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年会的同志们一起，召开各种座谈会和讨论会，对戏曲现代戏创作演出中的困难和问题加以讨论和研究，以便从中寻求解决的办法。

最后，预祝这次汇报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一九八一年十月七日）

——《文艺研究》1981年第6期

艺 术 与 生 活

郭 汉 城

(一)

福建是我们中国戏曲发源地之一，是久响往之的地方。这次有机会来了，恰巧逢上两件大喜事，一桩是正在举行全省现代戏会演，还有一桩是正在召开全省剧目工作会议。五、六天来的所见所闻，得到一个总的印象是：我们这里的戏剧工作很活跃，很有生气，一种兴旺发达的景象。

看了现代戏的演出，对戏曲发展前途的信心增强了，觉得戏曲还是有生命力的。在北京召开的剧目工作座谈会期间，有的同志很耽心戏曲不可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快消亡了。当时福建去参加会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看了你们的现代戏，说明你们的看法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用实践证明着你们的观点。从会演的剧目中，可以看出同志们在努力克服“四人帮”散播的脱离生活的倾向，在艺术形式上，努力追求戏曲化。目的是要提高现代戏的质量，这是很对的。这样坚持努力下去，我们的现代戏就大有希望。

一个剧种的消灭，并不是绝对不可能，中国戏曲发展历史上有过这种现象。中国有，外国也有。排除一切条件，说它绝对不会消灭和说它注定要灭亡，同样是不科学的。一切都脱离不了时间、地点和条件。戏曲的兴衰也是如此。在这些条件中，人采取什么态度对待它，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

部戏曲历史，包括我们建国以来三十年戏曲改革的历史，有无数经验可以证明，粗暴可以使它消灭，保守也可以使它消灭。粗暴和保守都不符合它本身发展的规律，都脱离群众的要求。所以事在人为，只要我们不消极悲观，而是采取积极地、正确地发展的态度，那么，我们的戏曲艺术就有前途。我们如不改革，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跟不上观众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的变化。陈贻亮同志说得好：艺术形式，没有绝对的凝固，也没有绝对的僵化。中国戏曲从宋杂剧到南戏、北曲，到清代地方戏，到京剧，一直到现在，它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发展变化的历史。但人的思想可能僵化，如果以僵化的态度对待戏曲艺术，它就很可能消灭。

今天，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古老的戏曲艺术现代化，扩大它的表现领域，使它能够表现现代生活。完成这个任务，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原理于戏曲改革的实践中，并且取得了胜利，这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我们的戏曲艺术，从它产生起直到今天的将近一千年中，一直在广大的城乡流传，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广泛的精神联系，传播着文化、历史知识，一代一代地培育着人民的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这样一种艺术，我们没有理由采取让其自生自灭的态度，我们要革新它，发展它，使它不但在我国古代文明中作出贡献，而且在今天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成为有力的武器。如果搞不好，不积极，不慎重，后人就要埋怨我们。我觉得，解放以来，党制定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戏改成绩很大，发展很快；但问题不少，教训也很多，尤其是遭受了“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和摧残。如果不是“四

人帮”破坏，我们戏曲事业（包括现代戏）的面貌必然比现在好得多。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总结戏曲发展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戏曲改革的经验，看看三十年是怎样走过来的，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从而避免再走弯路，避免重复错误。

（二）

在戏曲发展的问题中，有一个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并且牵涉到很多文艺上的基本性问题，诸如文艺区别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点问题、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等，如果不搞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就难免产生偏向。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个艺术与生活关系问题。

文艺要反映政治，但又限于只反映政治。这是由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这个基本事实决定的。生活是广阔的、复杂的，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生活。因此文艺创作的题材也应该而且必须是丰富多采、多种多样的。题材多样，反映生活面广泛，是一个时代文艺发展的必须的条件。我们的生活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人们生活在社会中，由于阶级、地位、经历、遭遇等等的不同，他们具体接触、感受和要求解决的问题也各不尽相同，题材狭窄、单调，必然影响读者、观众面的广泛，限制文艺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作者来说，也是如此。每个作者对各方面的生活、各种问题的熟悉、了解、感受的深浅也有不同，强制写某一类题材，反映某一方面的生活，只能束缚作者的才能和创造性的发挥，于文艺创

作的发展也是不利的。所以不能把政治题材强调到排斥一切，只此一家的地位；也不能把文艺的功能缩小到只为政治服务这一种功能，而排斥其它的功能。同时，我们也不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看得过于狭窄，过于简单，似乎只有政治题材才有为政治服务的作用。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组成这个整体的一个部分，或一个侧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有时是互为因果的。政治生活并不是与其它各方面的生活相隔绝，非政治题材，并不是对政治不发生影响，不产生作用，这种情况，在文艺史上是很多的。《牡丹亭》、《白蛇传》，就题材来说，并不直接反映政治，但它们与当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政治作用；文学作品这类例子也很多，鲁迅的《阿Q正传》没有直接描写辛亥革命，但它总结着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揭示着中国人民革命的道路，不能说它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文艺作品要写人，人总是社会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要在人身上反映出来，而且在实际生活和斗争中，这些关系溶化在思想、感情、倾向、道德、审美等精神状态中表现出来。我们说人是很复杂的，就因为它是这样一种社会的人。我们写政治题材，当然要写人的政治倾向、政治态度，但这并不排除它作为社会人的复杂性。写其它题材也同样如此。不然人物很容易成为某种思想、某种倾向的简单符号，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当然，这不是说，体现在人身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都是平分秋色，不分轩轻，阶级关系，对各种关系起着影响和制约的作用。也不是说，按照生活本来面貌写出人物的复杂性，可以不要作者对

人物的评价，也即是作者倾向性。二者应该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至于评价是否正确，则要看作者的立场、态度和他的整个世界观了。

我们这样讲，是为了说明文艺与生活、与政治的关系，不要把这种关系看得太简单，太狭窄，以致影响文艺的发展。但这决不是说，题材无区别，文艺反映不反映政治、为不为政治服务是无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看到，政治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的关头，又往往处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在它长远而广泛、深刻的程度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命运密切联系着，人民群众关心它是十分自然的。这个情况决定了文艺反映政治、为政治服务的重大作用和推动文艺本身发展的密切关系。我觉得在我国戏曲发展的历史上，这个事实特别明显。元曲的兴起，与暴露元王朝的黑暗政治、歌颂人民的正义斗争是分不开的。《窦娥冤》、《陈州粳米》、《汉宫秋》等，在当时是震撼人心的作品；南戏的《琵琶记》也是如此；昆曲由一种清唱的曲子发展成为统治一代的主要的戏剧形式，是与反映明王朝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反宦官、权臣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浣纱记》、《鸣凤记》和汤显祖的“四梦”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的作品；反映、总结明王朝亡国历史的悲剧《千忠戮》、《桃花扇》、《长生殿》，推动了昆曲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说明它们扣动了多少人的心弦；而明末清初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戏，以一种艺术上还不很完善的戏曲形式终于取代了艺术发展得更高的昆曲的地位，与它采用了大量《水浒》、《三国》等演义的军事、政治题材，适应当时蓬勃发

展的农民起义和民主思想直接有关。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关心人民、关心生活、有重大时代责任感的作者，应该反映生活中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事件，使文艺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戏曲所以要反映现代生活，特别是反映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相联、与国家的命运生死攸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为实现这个伟大任务服务，是发展现代戏的根本保证。

文艺要求广泛地反映生活，也要求重视反映政治生活，二者是不矛盾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但不只限于为政治服务，也不要把为政治服务理解得十分狭隘，这也是不矛盾的。“四人帮”那种只准写阶级斗争，禁绝任何其它题材，或不论任何题材、任何作品，都要加一个阶级敌人，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的做法是荒谬的，结果如何呢？门前冷落，阶生青苔，造成了八个阶级斗争的“样板”，统治了十亿人民的文坛的可悲局面。

政治生活既然是整个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且各类生活又不是截然隔绝，互不相关，而是交互渗透，交互影响，生动多样，姿态万千。在政治生活中的人，也是有血肉、有个性、有不同倾向的具体的人。所以文艺反映政治，应该从实际的政治生活、政治影响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政治概念或某些政策条文出发。从政治概念或政策条文出发，必然导致公式化、概念化和千篇一律。

我们要提高现代戏的质量，进一步肃清“四人帮”散播的随心所欲、主观臆造、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创作上唯心主义流毒，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北京开座谈会期间，我问一位同志：为什么现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特别少。农村有

八亿人民，是一个重要的服务对象。他说，不好反映，政策不明确。这个回答还是包含着从政策出发的意思。某一项政策总是按照一定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来制定的。这项政策是否正确，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要看它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作用，要在实践过程中调整、丰富和发展。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政策也会发生变化，没有永远不变的政策。因此，文艺创作还是要从生活出发，写人们在生活里面喜欢什么，反对什么，按照生活的实际，说出人们的心里话，反映他们的欢乐、痛苦、要求、愿望。当然这并不是说，作家对政治、政策是无关的、可有可无的，相反，作家必须密切联系政治，要有冷静的政治头脑，尖锐的政治眼光、热烈的政治情绪和深刻理解政策精神。要充分研究政治，政策在实际生活中、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的作用，才能真正区别它们的正确和谬误，真实、准确地反映生活，说出人民心里要说的话。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作家，总是有伟大的政治抱负，既是文艺家，又是思想家。

同志们说到文艺作品要不要主题思想，这个问题也与我在上面谈的问题有关。要不要，先要看有没有。如果有，不要不行；如果没有，硬加也不行。我以为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客观地存在于作品中的。一个作家反映某一方面的生活，总是按他的认识去反映，绝对排除作家的认识纯客观地反映，是不可能的。作家把生活里面的各种事件、人物，组织在一个统一的认识里，这就形成作品的主题思想。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有深有浅，有正确有错误，但不可能没有。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流派，在表现方法上有显明与含蓄之分，却没有有无之别。如果作家对生活没有自己的认识、见解，看到什

么写什么，罗列现象势必杂乱无章。无法高度的集中与概括。老舍的《茶馆》写了从清末到解放前的五十年的历史，包括了三个朝代。在这长长的五十年中，有多少事件多少人物呀？有多少的变化呀？如果要随便写，不知要写多长，根本无法成戏。老舍把五十年历史写在一起，就得把五十年的历史本质地反映出来。在中国，清朝、军阀、国民党都不行，中国的资本家也不行，历史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果作者没有从这五十年的历史生活中得出这个合乎客观实际的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写成的。所以我们不反对主题思想本身，而是反对“四人帮”鼓吹的“主题先行”。所谓“主题先行”，与从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抽象的政治概念和政策条文出发，是创作的唯心主义，都是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至于作品的主题思想，不但该反对，而且是作品所必需，因为它是整个作品的灵魂。有了它才能把各种人物的性格、人物之间的关系有机地统一地组织在作品整体之中。这就要求作家广泛地熟悉生活，深刻地认识生活，要有高明的艺术技巧在描写生活的同时表达着深刻的正确的立意，也即是作品的主题思想。

也有的同志说，应该强调思想，不强调就会缺乏主题的鲜明性，人家会看不清楚。强调是应该的，我们中国的文艺从来就有这个传统。但强调不等于强加，不等于讲空洞的大道理。一个作品，只要真实反映了生活，正确认识了生活，群众是能够理解的，我们要尊重群众，相信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想象能力。群众是千千万万的，一个作家的经历，知识无论如何没有千千万万观众丰富，积极的办法，就是要以最精炼的概括笔触，塑造典型形象，以生活本身（被作家正确认